读本好书

叩问历史 烛照现实与人心

——读迟子建新作《东北故事集》

■任诗桐

勾连东北历史的三部中短篇小说，组成了迟子建最新的小说集——《东北故事集》。三部作品在精神内核上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而故事情节与表现方式又各有特点。这如同音乐艺术中的套曲，通过不同的乐曲或乐章组合成套来呈现同一主题，既可独立存在，合起来又是对文本意蕴的加强。

《东北故事集》中的三部小说均以历史事件为叙述背景，具有还原现场的真实感。《喝汤的声音》通过描述黑龙江边哈喇泊家族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再现了发生于二十世纪初的海兰泡惨案对普通百姓命运的影响。作为幸存者的祖母，在逃生过程中因仇恨咬碎了牙齿，这一缺陷从此在家族内传继，三代人也因此喜欢上了喝汤。

北宋时期，宋徽宗在联金抗辽的过程中将大宋王朝送上末路。面对金国围剿，徽宗帝在将皇位禅让于赵桓后惶惶南逃。但即便如此他也难逃厄运——最终徽钦二帝携家带眷被囚禁于五国城，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境内，他们在此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中篇小说《白釉黑花罐与碑桥》即以此为背景，通过虚实相应的叙述，重构了徽钦二帝被虏至五国城的历史。

《碾轧甲骨的车》则“以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的失散为切入点，主场景是东北重镇旅顺。”

在叩问历史的同时，作者一直在试图借由文学文本实现与现实的对话，从而形成双重叙事套层，在当下与历史、现实与梦境、事实与虚幻之间自由穿梭。《喝汤的声音》中，故事里是哈喇泊三代人的家族命运遭际，故事之外是“我”借出差机会对亡妻的缅怀。《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以“我”带有魔幻色彩的一次奇遇为线索，分别在上半夜和下半夜邂逅了一个窑工和摆渡人，以宋徽宗流落民间的两个宝物——白釉黑花罐、青石碑为载体，讲述了两个关于宋徽宗的故事。在结构上，小说由楔子、上半夜、下半夜、楔子构成。首尾楔子中，以“我”的现实生活状况为主要叙述内容，徽钦二帝的故事则在上半夜和下半夜中，以梦境叙事的方式呈现。“我”作为一个退休的文物鉴定专家，代表的是史书的叙述视角，与窑工、摆渡人的个人视角互为补充，通过历史与现实交错、事实与虚构互溶，把本就富有传奇性的历史人物塑造得更加立体丰润，形象可感。《碾压甲骨的车轮》以甲骨与车轮为媒介，将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个历史名人之间的往事与当下人物的生活轨迹紧密结合。李贵的失踪，贺磊的死因与“我”情感的归属，皆与历史中的迷雾一样，充斥在无解的命运轮转之中。

在回望历史的同时，作者试图探讨的是有关民族记忆与文化传承的议题。牙齿的缺失与喝汤的声音，显然早已超越了生理层面，而成为一种民族印记，所谓“没齿难忘”，即是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对历史进行了新的解构。窑工和摆渡人作为徽宗后人，将制窑和鱼皮工艺传承下去，白釉黑花罐、碑桥与甲骨，更是作为文化与艺术永恒的象征而存在。

迟子建曾说：“牧师用经义布道，作家用的是从心灵流淌出的文字。”作者正是通过慈悲、宽厚故事所具有的撼动人心的力量，为处在滚滚红尘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份心灵的慰藉。哈喇泊一家随历史浮沉的坎坷命运，在摆渡人的讲述中，融化了“我”内心的坚冰。摆渡人原指在渡口码头用船只为来往人群提供交通服务的人，在文学文本中则多具有隐含意义，即把人从罪恶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从痛苦的此岸渡向快乐的彼岸。这一意象在《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中再次出现，其既是故事的讲述人，也是“我”灵魂的救赎者。而在《碾轧甲骨的车轮》中，作者同样借助现实与历史的交织叙事，指涉人物的心灵世界，强化了救赎的主题。

无独有偶，回顾迟子建的创作历程，其围绕同一题材或主题，展开不同声部叙事的案例比比皆是，如讲述旧时代故事的《秧歌》《旧时代的磨坊》《东窗》《香坊》，以洗澡为主要线索的《清水洗尘》《泥霞池》《空色林澡屋》，以哈尔滨为故事发生地的《起舞》《晚安玫瑰》《黄鸡白酒》，展现大历史背景下世态生活图景的《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等皆是如此。这种有意识的组合创作，丰富了文学文本的表达方式，也为读者提供了多角度阅读与阐释的空间。

星空中的科技智慧与文化传承

——读李亮《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

■林 颐

讲到天文学，大众读者通常只以为它就是科技史，而忽视了中国天文学内蕴丰富的传统文化因素，特别是与政治文明的关系。

阅读《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作者李亮在序言中就指出：“在古代的天、算、农、医四大科学中，天文学担负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重要任务，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在古代中国，天文学也与政治（特别是皇权）紧密相关，甚至长期被供奉成官方‘正统’之学。”这句话，可视为全书提纲挈领的写作宗旨。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带着浓重的神话传说色彩。女娲补天的五色石，可能指向了极光贯穿紫微垣的壮观天象；后羿射日，“日中有踆乌”，这是先民注意到了太阳黑子的活动；夸父逐日，先祖重黎绝地天通，阏伯与实沈参商不相见……神话传说不乏远古人类对宇宙的想象和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观察，它们涉及了宇宙结构、天体演变、星辰运转、日影测量、干支历法等一系列天文学基本常识。我们的祖先是最早注意到这些现象的古代人类族群之一。

我们的祖先创立了独特的天文学体系。比如，甲骨文中使用的干支纪日法，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马王堆汉墓出图的彗星图案，海昏侯墓出土的计时奇器铜壶漏刻，祖冲之与《大明历》，敦煌的《星图步天歌》，宋辽金时期的历法较量，郭守敬与《授时历》，明代的钦天监，汤若望与《西洋新法历书》……这些内容占据了全书的主干。

中国古代通过恒星观测建立了星象联系，三垣二十八宿的体系概括了全天可见星空，这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中国古代星图在绘制手法和准确程度上都是不断进步的，显示了一种颇为悠久而且持续不断的天文制图传统。我们的计时仪器和历法编纂也是相当先进的，中国的传统历法是一种兼顾朔望月与太阳年的阴阳合历，涉及日、月、五星运动、交食、节气等一系列天文研究，强大而缜密的历法推算带动了整个天文学的发展。

但是，我们的天文学有一个问题——它与星占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国语》就记载了武王伐纣前后发生的一些特殊天象，如“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以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垂象，见吉凶”。天象的变化对应着人间的祸福。所谓“顺应天命”，天文学成了古代统治秩序的理论根基，因此它必须被牢牢把控在封建统治者的手里。中国古代天文学就成了官方性质的学问。这样一来，它固然能有强大物质资料的供应、人才储备和背景支撑，但也很难走出固有规则的囿限而放弃了新的理论建构与突破。

本书中写道，朱元璋痴迷于观测天象，非常依赖“天象示警”，重视搜揽天文和历法人才，还要求皇室子孙都修学天文和星占术。后来，在明代天文学不断发展的同时，欧洲也进入蓬勃兴盛的科学启蒙时代，天文学成为近代科学的奠基石。不过这样对比来看，中国天文学原先具备的优势反而越来越成为限制它自身发展的主要障碍。到了清朝，西学东渐，汤若望以其出众的管理才能和科学才华深受清廷的赏识。可是由于人事斗争，汤若望入狱，这起事件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产生激烈后果的表现。

这种矛盾冲突，无法通过中国古代天文学自身的完善来加以克服。1912年1月1日，《改用阳历令》颁布。改历法和定正朔向来是新政权确立的象征，而这一次与从前有很大区别，它意味着与国际接轨，承载着政治责任的历法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科学的名义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

全书最后一章以激昂人心的笔触，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取得的天文成就。中国积极成为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要成员，同时保留着我们独具一格的中国文化要素，向着浩瀚的宇宙，以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继续踏上星辰大海的征途。